

# “德国之声”

沈次农

柏林爱乐乐团的上海音乐会让我对乐团有了新认识——如此名声辉煌响亮的超级名团，居然仍有出人意料的更强表现力。不是说“天团”么？“天团”应该理解为水平到顶吧，但它却更上了一层楼，不由得让人拜服之至。

其实之前我对柏林爱乐的印象并不像宝塔尖那般高不可攀，内心一直不愿接受它的“天团”称号，觉得有牵强之嫌。这与我听它的音乐会经历有关：

我听过西蒙·拉特指挥的布鲁克纳，也听过他指挥的现代作品；听过其他指挥家指挥的柏林爱乐；在上海听过，也在柏林听过。前后二十年大约有五六场之多。虽然每次音乐会都很享受，但在欣赏之余，也隐约感觉得到其他顶端国际名团相比，差别不大且各有长短。尤其拉特指挥的布鲁克纳“第九”，记得那天我是怀着极度兴奋和满怀企待的心情前往上海大剧院的。但音乐会散场时我却不由得心旷神怡。

或许正应了乐迷朋友口中所传那样：自从西蒙·拉特上任后，柏林爱乐的“德国之声”变了。

而那样的“德国之声”，我在杨松斯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上听到过，在蒂勒曼指挥的慕尼黑爱乐乐团听到过，在格万特豪斯乐团听到过。虽然在德国，能奏出德国之声的乐队的有好几支，但最好的“德国之声”，无疑公认是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。

但我无缘听到卡拉扬，也无缘听到卡拉扬的继任阿巴多（想象阿巴多时代至少还能残留些卡拉扬的德国之声）。当我有幸能听到柏林爱乐时，已经是拉特时代。

我曾问陈唯正，柏林爱乐的德国之声还有可能回来吗？他说：“如果让蒂勒曼来指挥德奥作品，我想应该能回来。”于是等待蒂勒曼率柏林爱乐来上海成了我的梦想。

什么是德国之声，文字表达有难度。纸上谈音乐，如隔靴搔痒，说不好，更说不准确。借用美术评论惯用赞美词，便是“浓墨重彩”。一样的乐曲，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乐队人数，有了德国之声，乐队形象就不一样。

并不是德国乐队发出的声音都能称“德国之声”。它仅指德国极少数杰出乐队在演奏特定曲目时的华丽声音。除了柏林爱乐外，德国周边一些历史较悠久的乐团也有受此影响的，但并不很多。

我们常常议论各家乐团的好与不好。其实乐团表现水准完全可能因不同指挥，不同曲目，甚至人员出入等因素引起差异与起伏。经常买套票音乐会的听众会比较容易觉察出这种差别，偶尔涉足音乐会的就很难辨别。

芝加哥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张立国曾有过一件往事——有一年巴伦博伊姆率柏林国家歌剧院到美国演出，他被德国乐队出色的弦乐音色深深吸引。“他们的声音温暖之极，有一种很强的人性味。”那时张立国在芝加哥担任首席已十多年，名副其实的德国名团宿将。情不自禁下，他向巴伦博伊姆提出，希望能有机会让他进柏林歌剧院乐团进一步体验，哪怕是一次演出也行。巴伦很欣赏这个中国音乐家的进取精神。

一个月后，张立国接到邀请赶赴柏林，参加《阿伊达》的排练和演出，“记得我第一天进入乐团，所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……后来我又参加他们很多演出，包括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，还到日本巡回演出全套瓦格纳《指环》。我学到了很多很多。”

需要注意的是，张立国所在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在美国常年名列榜首，而柏林国家歌剧院乐团在德国却无此殊荣。张立国对我说：“我看到柏林乐队的

演奏是全身心投入的。这不是一种形式，而是一种本能。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。音乐是他们的生活，不是事业。美国音乐家虽然有很高的敬业精神，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事业。这就是不同之处。以前我看索尔蒂指挥下的演出录像，我在里面正襟危坐，觉得自己很投入。但是现在看完全就是个局外人。这就是区别。”

或许这就是德国之声的真谛。即使美国顶级交响乐团，也没有这样的表现。而这样的声音，发烧友坐在家里听唱片是得不到的——大音箱没用，Hi-fi级系统没用，要Hi-end级的那种音响，还要客厅够大，才能勉强听到。真正想听到，必须进音乐厅。当然还要乐队对头，加上曲目对头。

理论上说，每个乐队有自己的声音。乐队的声音来源于长期合作形成的风格，也源于指挥家的训练要求。好的乐队与指挥家的关系犹如合作双方，既相互配合，又处于长期谈判与争执之中，此起彼伏，没完没了。虽然按规则指挥家是领导，乐队应该服从指挥，但乐队常有反抗。越是优秀的乐队，有不同看法，不买账的越多。这样的例子在乐坛历史上屡见不鲜，但争执过后依然同心协力。但也有例外。

这次率柏林爱乐来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基里尔·佩特连科，五年前刚登上柏林爱乐首席指挥宝座。而在前一刻离职的西蒙·拉特，其实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辞职申请。

通常认为，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的宝座向来位高权重，举世瞩目，名利双收，抢手得很。登上宝座犹如教皇登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没有人会轻易离开。

卡拉扬的前任富特文格勒68岁于任上去世，去世时还有音乐会没有完成。卡拉扬81岁于去世前两个月多才宣布离任。他的继任阿巴多在干了十多年后因胃癌辞职。而拉特提出辞职之时，正当壮年风生水起之时，无任何其他牵挂，什么原因呢？

何况，即使提出申请，他仍需要六年后才能离开，因为有合同约定。而他提出辞职申请时，并没有其他去向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如何，他都决定离开。

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决绝？欧洲的记者立刻行动起来，四处打听，忙碌很久却得不到任何确切结论，而坊间确实有各种猜测传说，莫衷一是。

我问陈唯正。他在德国生活了近四十年，又是铁杆乐迷，常年不懈听音乐会，对欧洲乐坛掌故了如指掌，还结交了许多德国乐队的音乐家朋友。问他，应该八九不离十。不料他说：“我帮你问ChatGPT。”

ChatGPT的答复称得上面面俱到却又不得要领。它从职业规划、艺术兴趣到个人愿望、家庭发展到乐团内部关系，看上去掌握了有关西蒙·拉特的所有个人资讯，却最终拿不出一个肯定的结论。

我们知道，ChatGPT的答复是建立在综合所有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。但如果西蒙·拉特从未在任何场合坦率说

出自己的辞职原因，ChatGPT是无法将这个谜底揭晓的。它也只能含糊其辞，只能猜测。

章诒和说过：“艺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群体。你只能看到外表。他们会和你很亲热，但决不能让你知道他们的内心秘密。”她是在写程砚秋时写下这段话的。而中外艺人内心本质上应该相通。

我以为，就以柏林爱乐首席指挥的重要性而言，尽管ChatGPT的回复有点像“官宣”，模棱两可。但真正原因应该在内部关系上，具有敏感而难以言说的苦衷。

在欧洲，乐队和指挥家的关系紧张与否虽然很少见诸报端，但从来就是媒体极关注的目标之一。

西蒙·拉特上任以后，全世界都看到了，他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他还不到五十岁，年轻气盛，雄心勃勃。他看出柏林爱乐因保守传统带来的迟滞不前。他不断在音乐会上插入当代作曲家的作品，他要让年轻人来听音乐会，因此他必须改变乐队长期固守的传统曲目。他让乐队参与学生课外活动，以培养学生对交响乐的兴趣。他首次建立数字音乐厅，把柏林爱乐的音乐会通过数码传输传播到全世界。他搞“午餐音乐会”“深夜音乐会”，利用一切空间对公众开放乐队音乐会。他对公众开放柏林爱乐的排练时间。他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向外界做各种宣传……

经过几年的辛苦与努力，人们看到，乐团音乐会上座率上升了，原来开场前就能买到入座的逐渐变为需要提前订票甚至抢票。听一场柏林爱乐音乐会甚至

成为旅行社组团的亮点项目。与此同时音乐会票价节节攀升，近乎翻番。节目册也取消了从卡拉扬时代延续而来的免费政策……种种迹象表明，柏林爱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原来仅限乐坛与爱乐者的范畴，成为更大范围的关注目标。

“天团”的称号就此产生。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发现，向来被引以为傲的柏林爱乐的德国之声，在不断排练当代作品的过程中，渐渐消失了。乐队驾轻就熟的传统曲目演奏得少了。而因为新作品，乐师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排练时间，却失去了驾轻就熟的表现机会，还得不到更多演奏艺术发挥中的会心享受。

曾看到一段介绍，一位前卡拉扬学院成员说：“当我观看了柏林爱乐乐团的巡演，他们演奏布鲁克纳的《第九交响曲》既缺少了传统的温暖，也缺乏清新。乐团演奏得很要命，既响亮又狂野，但没有形状和深度，好像根本没有指挥。”（节引自《今日音乐（Music Today）》）

我不知道他提到的是不是我听过的那场布鲁克纳“第九”——2013年柏林爱乐到中国巡演，在上海大剧院演出，我去听了。“既响亮又狂野，但没有形状和深度”——这描述恰好是我的印象啊。迄今十余年，令我失落至今。我曾对朋友说过，我的印象，柏林爱乐很像团体操，漂亮、美观、震撼、大气磅礴，但缺乏内涵。看来和我看法相同的人竟然还有。

乐团内部的争执随之而起。但多属传闻，不足为证。倒是2009年首席圆号拉德克·巴博克（Radek Baborák），与西

蒙·拉特就音乐处理的来由争论终于被媒体查实了。双方互不相让，拉特不得已使出杀手锏说：“你就照做吧，因为我是老大！”据说后来拉德克·巴博克最终愤而辞职，去了其他乐团。

艺术处理有不同看法在乐团内部原属司空见惯，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，也是少有。

但不得不承认拉特仍不失为一位伟大指挥家。除了乐团内部的纷争，他在国际乐坛的威望始终如日中天。他把柏林爱乐从国际舆论的“超级乐团”提升到“天团”。

应该承认，柏林爱乐这块美玉被卡拉扬握在手太久，谁得到了都想来一种新的玩法。每个指挥家上台后都想有所作为。阿巴多也一样。拉特也没做错。然而，传统的力量或许真的很难改变。乐师们固然因为乐团影响与收入增加而接受了，谁说这里面没有一个“忍”字呢。

拉特太“新派”了。虽然让大伙增加了收入，但他确实又让大伙失去了拥有原先传统的优越感。德国之声消失了，顶着天团头衔的柏林爱乐还是原来的柏林爱乐吗？持这种看法的人有点像坚持小众艺术的守旧人士，发着九斤老头的叹息。

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拉特只接受过一次关于离职话题的采访，是为柏林爱乐官方杂志《128》。在采访中，他说：“这个乐团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轻松，但当你达到了目标，伤口也痊愈了，你就知道这是值得的。你可能需要90岁才能正确地指挥这支乐团。”（《今日音乐（Music Today）》）



# 笔会

基里尔·佩特连科在指挥柏林爱乐乐团。陈岩 摄于上海大剧院

# 当归，中国天使草

曾泰元

当归，是草本植物之名，根入药，主治血虚，有补血活血、调经止痛之效，常为妇科用药。民间有人称，当归能让血液流至其当归之处，故名。正因如此，当归有个形象鲜明的英文昵称female ginseng（女性人参），说的是当归的外形类似人参，滋补功效有如人参，对女性有诸多好处，能调理女性的体质，治疗妇科的不适，是女性版的人参。

当归，又是“应当归来”之谓也。历史上，曹操曾用当归试图劝降东吴名将太史慈。西晋史学家陈寿的《三国志·吴书》载曰：“曹公闻其名，遣慈书，以篋封之，发省无所道，但书‘当归’。”东汉末年，诸侯林立，曹操听闻太史慈威名，求贤若渴，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个小箱子，太史慈打开之后，发现里面没有书信，只见当归这一味中药。曹操藉物托情，以当归寄其所思，传其所愿，劝太史慈转投曹操阵营。

当归的这一寓意，后常见于古代诗文，比如宋代苏轼《寄刘孝叔》就写道：“故人屡寄山中信，只有当归别语无。”辛弃疾《瑞鹧鸪·京口病中起登沧浪观偶成》写道：“山草归曾呼远志，故人今又寄当归。”此处的山草和远志乃

一物二名，而“远志”既是可入药的草本植物，又是普通词语，意为远大的志向。词人以远志自我提醒，勿忘过去的鸿鹄之志，而老友如今却又寄来了当归，以物寄情，婉转劝归。年少时心中激情澎湃，壮志凌云，年老时意欲自在忘机，归隐故园，心境的消长起伏，不言自明。

【Chinese angelica】an Asian shrub or small tree (Aralia chinensis) resembling Hercules-club but less prickly and with a long inflorescence (一种亚洲的灌木或小乔木，学名Aralia chinensis，形似刺楸木，但刺较少，花序长)

根据英语世界最大、最权威的《牛津英语词典》(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, 简称OED)所载，天使草(angelica)之所以得名，可能是由于此类植物的根部闻起来香，尝起来也香，因而号称具有排毒抗癌之效，宛如美丽善良、护佑黎民的天使。

遍查各部汉英词典，当归的英文几乎都是Chinese angelica（中国天使草）。此Chinese angelica为俗名，乃学名Aralia sinensis之英译。值得留意的是，英语世界的语文词典只有《韦氏词典》(Merriam-Webster Dictionary)收录，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所指的却不是当归，而是“楸(sōng)木”：

【Chinese angelica】an Asian shrub or small tree (Aralia chinensis) resembling Hercules-club but less prickly and with a long inflorescence (一种亚洲的灌木或小乔木，学名Aralia chinensis，形似刺楸木，但刺较少，花序长)

韦氏补充说明，Chinese angelica（楸木）又称Chinese angelica tree（楸木树）。

韦氏的Chinese angelica是楸木，是另一种植物，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当归。韦氏的定义一直以科学性著称，它对植物的陈述是可信的，交叉查阅专业的数据库和权威的语料库，这样的解读也都得到了证实。

如此看来，Chinese angelica比较全面的情况应该是，作为当归英文俗名的Chinese angelica，目前在英语世界的证

据较少，影响有限，所以尚未入典。意为楸木的Chinese angelica，则出现较早，扎根较深，权威词典的收录反映了词语的现状。Chinese angelica是多义词，一是当归，二是楸木。

当归的英文不只有Chinese angelica。在专业的场合，常会借用其拉丁文学名Aralia sinensis（或简写形式A. sinensis）。在讨论当归的语境底下，若是不求科学上的严谨，也能借用属名angelica转指当归。不过需要明白的是，如果angelica在英语里单独使用，默认的指称对象是欧白芷（学名Aralia archangelica，俗名garden angelica）。

上述关于当归英译的讨论，均围绕着核心的angelica（天使草）展开，追根究底，都是在西方的科学话语体系底下所做的分类和辨析。

当归是中国所特有，英译中国特有事，最常见的手段是通过语音，古今皆然，放眼其他语言亦是如此。在英语世界，事实上音译的dong quai更为广为人知，而且还收录于四部权威的语文词典：《牛津特级词典》(Oxford Dictionaries Premium)、《韦氏词典》(Merriam-Webster Dictionary)、《美

国传统英语词典》(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)、《词典网》(Dictionary.com)。不过迄今为止，英语词典泰斗OED尚未正式收录，只见三则dong quai的语证散见不同的词条。

四部英语词典的收录，对dong quai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支撑。英语世界的各种语料库也都表明，dong quai的使用频次比Chinese angelica高出甚多，少则3:1，多则10:1，个别的甚至超过20:1，客观数据所展现出的多寡对比，在阿拉伯数字一目了然。

dong quai的英语发音没有固定的标准，权威词典的标注，记录在案的就有七种之多：《牛津特级词典》标[dɒŋ'kwɔɪ]或[dɒŋ'kwɑɪ]，《韦氏词典》标['dɒŋ'kwɑɪ]或['dɒŋ'kwɑɪ]，《美国传统英语词典》标['dɒŋ'kwɔɪ]或['dɒŋ'kwɑɪ]，《词典网》标['dɒŋ'kwɑɪ]。

《牛津特级词典》和《美国传统英语词典》的词源栏目皆云，dong quai源自汉语(Chinese)或普通话(Mandarin)的dāngguī。《韦氏词典》的词源栏目见解不同，认为dong quai源于闽南语的dong gui或是另一个汉语方言的同源词。《词典网》认为，

最后一句话可谓点睛之笔，让我想起很多音乐家都说过同样的话：“不到一定的年龄，不要弹贝多芬。”

还有许多伟大的音乐家早年录制了贝多芬的唱片，晚年又重新再录。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卡拉扬，一生录制了三次贝多芬全部交响曲，这都是柏林爱乐乐团。

西蒙·拉特递交辞职申请后，柏林爱乐盘点了所有条件适合的指挥大师，逐一安排他们前来开音乐会，目的是让乐队演奏员对他们有最新的考量。最终，最不被关注的基里尔·佩特连科胜出。

因为是乐团全体演奏员的投票结果，每一票都怀有“艺人的内心秘密”，加上佩特连科不接受采访，各种“秘密”叠加起来，以致我等万里之外的乐迷更不知柏林爱乐发生了什么事，会选择这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指挥家。和他一起参加竞争的蒂勒曼、杜达梅尔、尼尔森斯……哪个都比他有名，相信哪个都在心里踌躇满志，认为非己莫属。

而佩特连科上任以后，没见多少惊天动地的报道。比起当年西蒙·拉特上任之初，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

然而，今年六月下旬在上海大剧院亲聆柏林爱乐音乐会现场，我才发现柏林爱乐一改之前给我的印象，变得华丽细腻，层出不穷，克制收敛而又自由奔放。《英雄生涯》是我多次在音乐会上听过名曲，恕我愚顽，以前竟从未入心。这次的演奏却让我大开眼界，那么多互相交织的复杂声部，被佩特连科梳理得干干净净，线条清晰，就像放大的屏幕相片，再细小的画面也纤毫毕现。陶辛教授当时即以“木刻画版”形容，我以为是极其恰当的比喻。而勃拉姆斯“第四”大提琴齐奏后面隐隐衬着长号形成的低沉瑰丽声音，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德国之声啊。而这样的浓郁与华丽的全场比赛表现，正是在拉特时期的失落之处。

此时恍然大悟，原来乐队们选的不是指挥家，而是“德国之声”。经过与拉特18年的磨合，柏林爱乐演奏员们更清楚，他们需要的是什么。

我搜索各大英语语料库，在“英国国家语料库”(BNC)和“美国历史英语语料库”(COHA)找到了dong quai可能的最早文献记录。英语里的dong quai或许首度出现于1985年的《天外覆足》(Footfall)，此书是世界顶尖的科幻小说家拉里·尼文(Larry Niven)和杰里·波奈尔(Jerry Pournelle)合作的畅销巨著，主要描述的是外星人乘坐大型宇宙飞船来到太阳系，意图征服地球。书中在某个段落提及三十多种维持人类生命必需的营养素及其来源：

bee pollen, comfrey, dandelion, fennel, hawthorn berry, ginger, garlic... Fo-Ti, Dong Quai... Siberian ginseng, rose hips... (蜂花粉、聚合草、蒲公英、茴香、山楂果、姜、蒜……何首乌、当归……西伯利亚人参[刺五加]、玫瑰果……)

其中fo-ti(何首乌)和dong quai(当归)的形式与众不同，异质感突出，特别醒目。除了dong quai的拼法特别之外，何首乌的英文俗名fo-ti也让人费解。两味中草药的出现，外加隐藏在西伯利亚(Siberian)这个定语下的刺五加，在既叫好又叫座的英文科幻小说中，在与外星人接触互动的虚构情节里，中国声音也得到了适度的体现。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公众号